



《扫黑风暴》：光明需要共同守护

林立文/文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无法想象,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时代,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可以做到“净街”的程度。

解释一下,就是当它在固定时段播放时,街上变得很干净,连犯罪率都下降。

因为大家都回家守着电视机,等待这部迷人电视剧的播出。比如大名鼎鼎的《渴望》。

你可以理解为那个年代没有娱乐,人们比较单纯,但其实当下这个人们因为手机而无法专注的时代,一部好的剧集出现,对观众的吸引力仍然和“净街年代”没有差别。

《扫黑风暴》就是这样一部剧,它让我想到《人民的的名义》《沉默的真相》这两部与之类似的现实主义剧集。当我每晚带着上班的疲倦追着看这部剧时,哪怕生理困倦,精神却极亢奋。

我不会习惯性地扫一下手机信息,我会关掉弹幕,绝不会想要开倍速观看。

追下去的念头非常强烈,因为这部剧有一个让人着迷的特质:即使你猜得到事件走向,人物善恶,但你脑子里还是充满“为什么”。

从前是警察,现在游走在灰色空间的李成阳,为什么发自内心信任黑势力头子马帅?我能猜到他是想借由担任新师团第二把手的机会,调查自己在警局的师父的死亡真相。但为什么,明明有罪在身的马帅,能让是非观念极强的李成阳甘当小弟?

我能预感到,绿藤市有哪几个“人民公仆”注定要被中央调查组依法严惩。可为什么,目前为止暴露得最多的董区长,却显示出让人不寒而栗的自信。他和马帅,为什么曾经“共生死”?

绿藤市这个虚拟的城市,为什么如此熟悉?

《扫黑风暴》出现的人物群像,让网友们再次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演技”。

孙红雷、刘奕君、宁理这三大中生代男星的演技,是讨论重点。而王志飞、刘之冰、侯长荣、赵小锐等资深男演员,则凭借老辣无形的演技,让整部剧更加深沉厚重。

孙浩这样的非演员出身的老歌手,竟然能担胡所长这样的角色演出花来。苏可饰演的大江,脸上有刀疤拿起粉色保温杯却毫无违和感。

吴晓亮饰演孙兴,把陷入犯罪深渊因此被欲望反噬得歇斯底里的黑道打手,演得恰到好处。剧中,有一场孙兴在KTV逼徐英子喝酒的戏,我直觉饰演徐英子的杨雨潼被吓到发抖是出自本能,当她抬眼看向神经质的“对手”时,她眼前不再是演员,而是真的犯罪分子。吴晓亮压抑情感的演技,让孙兴的气场散发出一股让人不敢别过头去的异味。

当我们为一部剧全体演员演技在线而振奋的时候,请你相信,演员们比观众还振奋。观众苦闷剧久矣,演员何尝不是?

而这些演员的高超发挥,也是他们读透了所有“为什么”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改编自真实案例,是《扫黑风暴》之所以有如此能量的根本原因。主创们和演员们无需再为这些案例做法,他们反而得做减法,另一个被广为讨论的“尺度”话题,其实是减法的产物。

因为减得合理,《扫黑风暴》才符合各种各样群体的需求。

这部剧显示了扫黑行动的深远意义。将违法乱纪、罔顾初心的贪官污吏扫去,把为祸人间、无视法治的黑恶势力铲除,这只是扫黑行动的一方面目的。让人们相信光明需要共同守护,而非仰仗最勇敢的那些人去驱赶清扫,才是这场行动对国家最大的价值。

剧中人物,无论行为本身是否犯法,无论他们高低贵贱,从督导组、各级官员、各级警员、富人平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很累。

没有人在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社会里,能凭借一己之力获得解脱。《扫黑风暴》里有人赢得了利益,有人赢得了权力,但他们朝着未来望去时,都没法长出了一口气。

当他们忍不住问自己一句“为什么”时,他们会瞬间崩溃。

继续追《扫黑风暴》,希望到大结局时,观众们一直累积的“为什么”,都会变成“谢谢你”。

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遭到追捕,阎振玉将他们隐藏家中加以保护。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同志曾经在育青中学就读。从育青中学走出去投笔从戎,投身革命,奔赴解放区的学生还有许多,他们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有生力量。

抵制迁往台湾 迎接天津解放

陈苾民先生思想进步,长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他在北京和天津任教期间,经常掩护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学生,利用其知名教授的声望将一些被捕学生营救保释出来。他曾带头反对国民党三青团进入北洋大学,坚决反对国民党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反对他们对进步学生的迫害。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派人来北洋大学策动全校迁往台湾。陈苾民在校务委员会上坚决反对北洋大学迁往台湾,得到众多师生的拥护支持,被公推主持北洋大学校务。为了完整地将北洋大学保留下来,保证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陈苾民将数千名师生转移到租界,并组织护校队加强对校园的保护,迎接天津解放。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胜利解放。陈苾民任北洋大学(即现天津大学)校务临时委员会主席。四月,经过战火洗礼的北洋大学在原校址开学复课。一九五〇年暑假后,陈苾民离开北洋大学应聘华北大学工学院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数学系教授,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该校后来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陈苾民一直在北京工业学院任教,直至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逝世,享年86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解放后,陈苾民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编写了《高等数学基础》《高等数学教程》等著作和《工程数学》《数据处理》等讲义,翻译出版了《数值分析》等书。他曾担任高教部高等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他于一九七三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为了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应加强数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薄弱环节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的研究,得到周总理的重视。

陈苾民一生走过的历程书写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胸怀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情,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先驱,转向教育救国的践行者,保护思想进步学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走上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其精神值得我们褒扬和缅怀。

“岁月蹉跎星北指,乾坤浩荡水东流。”百年岁月流逝,这棵梓树依然挺拔,每年五四青年节前后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我站在百年梓树下,看着满树飘逸烂漫的樱花,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陈苾民先生是台州走出去的杰出代表,百年来,从台州走出了许多英才,他们就像绚丽的樱花一样展现出青春芳华,让后人永久不会忘怀!

一九二七年,陈苾民受聘当时校址在上海真如的暨南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举家南迁上海。他一边认真教学,一边著书立说,编写出版了《非欧几何学》等著作,致力于教育救国。妻子阎振玉是满族人,祖上曾是清朝大官,到父亲辈家境衰落,但她还保留着大家闺秀特有的气质,喜欢唱京戏。阎振玉毕业于北京高师物理系,曾任上海务本女子中学校长,后又任私立上海育青中学校长。

迁移育青中学 山沟里办大学

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会战爆发。陈苾民夫妇冒着纷飞战火于十月撤离上海,返回家乡天台。天台属于山区,周围群山环抱,相对安全。为了躲避战火,宁波、绍兴地区许多学生也纷纷撤退逃离到天台。陈苾民和夫人阎振玉决定将原在上海的育青中学迁来天台复校,解决战时县内学生和许多逃难学生上学问题。陈苾民任校董会会长,阎振玉任校长,先是在城西后坦信行寺办起育青中学初中部,随后他们拿出了历年积蓄数万元,在天台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在离县城不远的玉湖村新建校舍作为育青中学高中部(总部)。在陈苾民、阎振玉夫妇努力下,育青中学成功开办并逐步走上正轨。陈苾民于一九三九年底被浙江英士大学聘任为数学教授,不久兼任教务长兼学院院长。阎振玉和幼小的儿子陈以一仍留天台。从此,阎振玉全面主持育青中学校务。一九四一年秋,在平桥热心教育人士的支持下,原平镇集成小学主动让出校舍和课桌凳,创办了育青中学平镇分部。育青中学鼎盛时期,在三门海游和温岭新河都办有分部。

一九四二年底,浙江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成立北洋工学院,校址设在浙江泰顺百丈口镇,任命陈苾民为代理院长。在陈苾民主持下,北洋工学院在百丈口镇盖起了简易的木板瓦房作为校舍。在泰顺北洋工学院,陈苾民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他每天黎明起床,洗漱后去后山锻炼约一小时,早餐后在学校处理校务或上课、备课、写讲义,常常忙到深夜。由于泰顺离天台很远,又要绕道敌人后方山区兜一大圈,只能靠步行,单程也要走10天才能到达,数年来陈苾民很少回天台与家人团聚。

在抗战时期,陈苾民、阎振玉充满爱国主义情怀,在民族存亡紧要关头,坚持在国统区兴办教育,让躲避战火的广大青少年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这种精神难能可贵。育青中学和当时的天台中学、大公中学一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据陈苾民儿媳陈宁蒙女士介绍,他们家与中共地下党员丁魁梅是亲戚,关系密切。阎振玉接受了魁梅等推举出任天台妇女会会长。她请来执教的教师有一些是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城隍巷开设陶器书店,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阎振玉都暗中支持。一些进步学



1919年5月7日,在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的32名学生。北京高师欢迎被捕的8名学生返校,图中高立者(右一)为天台人陈苾民。

梓花烂漫话英杰

——缅怀五四运动先驱陈苾民先生



天台中学老校园(现天台实验小学)里的梓树。(摄于2021年5月4日)

陈政明/文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五月四日,我来到天台中学老校园(现天台实验小学)探望那棵饱经沧桑,见证了百年历史的梓树。梓树屹然挺立,树干需要两人合抱,树冠如硕大的华盖,满树盛开着略带米黄色的白花,绚丽烂漫,给校园增添了无限的春意。我忽然想起《诗经·小雅》里的诗句:“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我深深地缅怀从这里出发走上教育救国道路,始终心系桑梓的五四运动先驱陈苾民先生。

二〇一九年八月,在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之际,我专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陈苾民儿媳陈宁蒙女士家拜访,较为详细地了解到五四运动先驱陈苾民先生的生平事迹。一百多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崭新一页。

我伫立在梓树下,仿佛听到了它在叙述着一百多年前的那段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历史故事……

投身五四运动 一校两位先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一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下午四时许,游行学生们呼声震天,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到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前,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此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一边与警察对峙,宣讲爱国思想,一边绕宅而行,寻找破门之路。忽然一声响,大门打开了。原来已经有学生翻墙爬进曹宅,从里面把门打开了。学生们蜂拥进入曹宅,曹汝霖、章宗祥迅速躲避起来。四时三十分,曹宅被学生点燃起火。有史料记载,最先翻墙进入曹宅打开大门的是北京高师练过武术的学生匡互生和身材高大的学生陈苾民。曹宅起火后不久,大批军警开始大肆逮捕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其中有毕业于天台中学正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就读的孙德中和北京高师数理系三年级就读的陈苾民(此时名陈宏勋)。一所县级中学

走出两位五四运动先驱,这恐怕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加上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黄若籍学生牟正非,在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中台台人占十分之一。此外,临海籍学生项士襄在参加游行时被军警打伤。鲁迅先生赞誉的台州式硬气,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月七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声援下,北洋政府不得已将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全部释放回校。被捕学生返校时,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当时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找陈宏勋谈话,为了避免他再次被传讯或被捕,建议他立即更改名字。于是,陈宏勋将名字改为陈苾民,意思是忠于国家和人民,自此一直沿用此名字。

远赴法国留学 立志教育救国

陈苾民一八九五年七月五日出生在天台县城內,家住城隍殿(老城关一小)附近。一九一六年八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在高师读书期间,陈苾民积极参加学生自治组织,与其高一级的匡互生等成为好友,成立“平民教育社”。陈苾民一直怀揣爱国之心,时常表现出忧国忧民思想。他认识到当时中国国力衰弱,任由列强侵入掠夺皆因教育落后。他立志走一条学习西方现代教育,实现教育救国强国的道路。

一九二一年,陈苾民取得公费赴法留学资格。抵达法国后,他先在里昂大学学习,后来到了法国南部底雄大学理学院,追随数学家庞加莱之子小庞加莱教授学习数学。一九二五年他取得了底雄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高师数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其间,陈苾民认识了时为北京高师学生的阎振玉,两人产生了爱情,结为终生伴侣。



陈苾民、阎振玉夫妇

石瑞芳与台州中心县委的故事(上)

石瑞芳,又名敬芬,字才芳,号祥麟,曾用名张益鹏、张鹏、曹珍、周郁、石磊等。1901年,石瑞芳出生于天台欢吞乡砂坑村一个富裕农家。他12岁开始入大余村私塾读书,因为聪明好学,深得塾师的赞赏。16岁转城关徐氏祠堂私塾,尔后考入文明小学。石瑞芳从小胸怀大志,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天台中学毕业后,在下周小学任教。

1925年至1926年间,台州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27年2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进占温州后,挥师北上台州。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温岭、黄岩、临海、天台等地民众沿途夹道欢迎北伐军。在革命的形势推动下,党组织在台州各地建立了农会、工会、妇女协会,并开展增资减时、减租减息等斗争。石瑞芳在天台中学就读时,就受到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在思想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在下周小学任教时,积极向师生宣传进步思想。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临海、宁海、温岭等地国民党当局

也撕下了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开始了“清党”和大搜捕,白色恐怖笼罩台州各地。在革命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石瑞芳于1927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石瑞芳被选为中共天台县委委员兼欢吞区委书记。

欢吞地处天台东部,北靠华顶,南接东乡,四面环山,是一个纯农业地区。1928年3月,石瑞芳在欢吞开始建立党组织,并成立了区委。7月间,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又逢天旱,粮食面临歉收。一些地主趁机抬高粮价,贫苦农民因买不起粮食而受饥挨饿,生活十分艰难。中共浙江省委指示天台县委,在欢吞开展平果斗争。随后,中共天台县委将机关移到欢吞,并在欢吞瓦窑村召开党员大会,发动平果斗争。石瑞芳主持大会,浙江省委特派员龙大道到会指导。为了扩大影响,顺利进行平果斗争,消除群众的顾虑,中共天台县委决定,先由地主家庭出身的中共党员带头平果,并由家庭困难的党员领头,带领群众去买平价粮,粮价按市价对折计算。由于党员干部在平果中的带头作用,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一齐拥入大地主家,打开粮仓,将粮食按平价卖给群众。中共天台县委和石瑞芳领导的平

果斗争取得了胜利。

同年6月,石瑞芳任天台县委书记。他在天台欢吞领导开展平果斗争,杀死国民党天台县委党部组织部长朱良庆。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1928年11月,天台欢吞的大地主葛逢源开设在大余村的泰宁当店失火,部分当物被烧毁。葛逢源企图将损失转嫁给穷苦百姓,借口当物被烧,拒绝农民赎取,即使没有被烧和不易烧坏的金、银、铜器也不能赎取。按照当店的惯例,当物入当,当价最多不能超过半值,因此,葛逢源吞没当物,老百姓当物就直接损失,尤其是那些贫苦农民,所当的物品大多是冬天御寒衣物,有的当物还是借来的。如今葛逢源以当店被烧理由拒绝赎取,穷人如何承受得起这个突然袭来的灾难?为此,中共天台县委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发动赎当斗争。

县委派出当户代表与葛逢源交涉,提出当物存在的,按当票额60%赔偿。但遭到葛逢源的拒绝。11月19日,党员率领群众包围了葛逢源家。葛逢源十分害怕,深夜跑到天台城里,向当铺大股东朱良庆求援。朱良庆是国民党天台县委党部组织部长,根本

台州党史 红色故事

李兆建/文

没把贫苦穷人放在眼里。第二天一早,朱良庆就同葛逢源一起来到欢吞,恐吓赎当群众。欢吞的贫苦老百姓群情激奋,与朱良庆针锋相对斗争。

朱良庆见众怒难犯,就溜到闹鱼头村佃户朱万信家,要朱万信为他代雇轿子,准备回天台县城搬兵前来镇压。朱万信夫妇和委托去叫轿夫的两人均为共产党员,他们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故意绕了圈子,回去告诉朱良庆雇不到轿子,并说葛逢源家里的群众还没有散去,马上要到闹鱼头村来找他讲理。朱良庆听了很惊慌,就叫当店学徒提着灯笼陪他当夜回天台县城。

朱万信等人得知后,马上报告石瑞芳。石瑞芳获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让这个国民党党棍、反动豪绅回县城,等于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不如杀掉这个反革命分子。于是,县委派出5位同志到路上袭击,杀掉了朱良庆。这就是震动天台全县的“赎当杀朱”。

“赎当杀朱”后,共产党组织预料到国民党政府必定会来报复,于是决定党内同志立即流动隐蔽,领导干部暂时撤退。当月,石瑞芳调任黄岩县委书记。